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日本學

第十七辑



世界知識出版社

日 本 学

第十七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世界学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柏 英

特约编辑：林 昶

责任出版：刘 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 第 17 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012-4293-1

I. ①日… II. ①北… III. ①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2086 号

日本学(第十七辑)

Ribenxue (Dishiqiji)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 <http://www.wap1934.com/>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照排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1/2 字数:299 千

2012 年 7 月第一版 201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293-1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

本辑出版承蒙林健忠晓阳

慈善基金会资助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确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

《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人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目 录

从北大《日本学》管窥中国的日本研究	宋成有 (1)
行政学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行政学	
书籍考证	毛桂荣 (18)
试论中国的日本狂言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李 玲 (34)
英国外交官萨道义的日本研究与幕末生麦事件	边文锋 (52)
越境的“亚洲主义观”——方法论的再探讨	姜克实 (66)
民意漂流与日本现代责任政党政治的困境	王 元 (81)
日本外交研究:从野田访华看野田内阁的	
对华政策	林晓光 (98)
宪政视域下日本的“1955 年体制”	
..... [日]淳于森冷 金 莹	(108)
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演变	[日]田中敦仁 (119)
中、日、韩人事行政信息化比较:制度化过程与	
公务员的接受性	[韩]申龙彻 王琳琳 (134)
日本 TPP 战略的决定因素和决策机制	宋 磊 (155)
中日政治文化中的权威主义之比较	梁云祥 (170)
日本的协商民主	
——以临时教育审议会为例	周建高 (181)
日本社区(自治会)的组织结构、功能以及与	
地方政府的关系	熊达云 (193)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促进主妇再就业的

供需因素分析 乔 芳 (207)

日本社会基础构成与神道宗教的传承

——以町内会与传统祭祀的关联为中心 赵 刚 (223)

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关于“大亚细亚主义”与“国家改造论”的

历史考察 周 彦 林晓光 (238)

战后日本右翼的思想与行动 程 蕴 (259)

安史之乱与日本 陈 巍 (276)

近代日本统帅权独立制研究 刘世刚 (298)

日本明治政府官派留华学生之嚆矢 孙伟珍 (315)

森山守次与《满洲日日新闻》创刊 [日]谷胜军 (329)

中世纪日中文化交流——禅与日本文化

..... [日]广濑良弘 (343)

编辑后记 (358)

从北大《日本学》管窥中国的日本研究

宋成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全国性的日本研究团体、各大学和社科院系统的科研机构的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出版刊物,以促进学术研究会交流。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编的《日本学》,就是其中之一。20多年来,北大《日本学》伴随着中国日本研究的步伐,走过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在新世纪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发展新时期的今天,《日本学》与中国的日本研究一样,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尚须继续努力,开拓前进。

一、《日本学》的办刊宗旨及其特点

1988年,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1989年,《日本学》第一辑出版。这个学术刊物大体上一年一辑,相当于年刊。《日本学》前十辑的主编沈仁安教授提出以下编辑宗旨:(1)研究立场强调科学性,“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2)研究方法主张多样性,“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3)治学坚持求真务实,“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地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确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4)办刊目标:“建立中国自

己的日本学”，为此而付出“坚毅的努力”。^①自第十一辑开始，编委会的人员进行了调整，但上述编辑宗旨不变，照例是每辑《日本学》卷首语。

归纳起来看，发表在《日本学》上的论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综合性。凭借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和理科齐全的传统优势，日本研究中心从建成开始就是一个跨院系（所）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日本学》的文稿主要由校内各院系（所）教学科研人员提供，涉及日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社会、语言、文学和思想、宗教等领域。为突出北大日本研究综合性的整体优势的特点，《日本学》从创刊之日起就开宗明义：“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②至今，依然如此。

2. 学术性。举凡学术刊物，贵在办出特色。日本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何确定自家学术刊物的研究重点，集中研究某些领域，有利于突出刊物特色。在众多的研究课题中，北大《日本学》以“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为研究重点，发表了多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样性和实证研究方法，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因为某一国的发展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③

3. 创新性。在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成果的情况下，加强研究的深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发掘新的研究资料、采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是学术刊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之关键。基于上述认识，《日本学》一方面倡导“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强调“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

①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前言》。

② 同上。

③ 同上。

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① 这种研究取向是为了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学这一长远目标,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中国学者应有的话语权。

4. 开放性。《日本学》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内外学者来稿。因此,文稿“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人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② 因此,每期《日本学》发表的论文中总有国内外学者、知名人士的研究成果,也选择性地刊登日本研究后起之秀的新作,或者发表日本在野史学(如小林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作者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此外,《日本学》也关注美国、欧洲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韩国、新加坡、泰国、埃及等国的日本研究动向和新成果,及时介绍,以飨读者。

5. 经世性。北京大学的前身清季京师大学堂,创立于 1898 年。当时,甲午之役中国兵败日本,《马关条约》迫割地赔款刺痛朝野之心。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发起戊戌变法,兴办学堂为急务之一。从京师大学堂时代聘请日本教习讲授《万国史》以发中国世界史教学的先河,到北京大学时代蔡元培校长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敢领风气之先;从北大师生率先倡导新文化运动、声援韩国“三一”独立运动,到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并派出代表团首访日本,在北京大学建校初期,就形成了与日本恩怨交织、错综复杂的认知构造。这种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日本观,深深植根于北大师生的精神土壤之中。因此,北大师生既能最先走上北京街头、掀起向日本争国权的抗议风暴,也能在中国的大学中最早开展日本研究。20 世纪 20—30 年代,李宗武、王辑五教授等在史学系讲

①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前言》。

② 同上。

授日本史、中日交通史等课程,评析日本民族起源与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演进,揭露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图谋,树立了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至抗战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师生辗转数千里,在昆明创办西南联合大学。在日本军机狂轰滥炸、日军压境和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坚持日本研究并开设日本通史、现代日本、日本政治经济状况等课程,为克敌而知敌。

新中国建立后,北大教授周一良先生最先在国内大学开设亚洲史、日本近代史等课程,培养日本史研究人才,也为历史系建立日本史、东南亚史、南亚史、东北亚史等新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日本研究活跃发展。当时,国门初开的中国不仅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借鉴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现实的需求促成北大日本研究虽分别开展于不同学科院系,但均具有现实性或经世性的特点。因此,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宗旨是:“加强和促进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推进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间了解与理解;促进中日两国社会的繁荣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①作为研究中心的学术刊物,《日本学》亦以此为依据,在办刊的过程中体现其强经世性。

二、《日本学》创刊后第一个十年的进展与经验

从1998年出版《日本学》至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创刊后的第一个十年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十年(1989—1998),由沈仁安教授担任主编,共出版十辑,刊登各类文章270余篇,总字数达330余万字。沈教授在1998年第四次日本研究杂志会议上的发言,总结了编辑《日本学》的体会。

^①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简介》。

(一)如何定位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阶段

沈教授认为,在引进与创新方面,我国的日本史研究经过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引进苏联、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70—80 年代的吸收和消化,至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进入创新阶段,在引进国外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日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以及多卷本《东亚视角中的日本历史》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建立有中国特色又走向世界的日本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① 沈教授认为,目前还应关注和解决某些问题。例如,在引进与创新的关系上的误区是“只从国内角度看创新”,“但从国际上看,不过是国外某种理论方法观点的翻版,并无新意”;再如,“盲目轻信他人的结论”;再如,“创新似无是非之分”以及“引进不结合中国国情”等。结果造成“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的“失语”现象。^②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中日文化交流在进行中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在资料收集、研究人员和图书交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障碍。“文革”十年期间,中国的日本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中国的日本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日两国文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并逐渐规范化、稳定化,中国学者、学子能够走出国门,前往日本收集在国内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接受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与日本学者开展面对面的对等交流。中国的日本研究利用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成果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日本研究界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乃至日文汉字对我国研究者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理论素养不甚高、国学根基欠缺的研究者来说,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和化”,在“失语”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成了日本学术的“传声筒”。这种现象以前已经存在,现在在某些场合甚至愈演愈烈,令人感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没有免费午餐”的含义。

① 沈仁安:《〈日本学〉编辑点滴思考》,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 437—438 页。

② 同上书,第 438—441 页。

（二）关于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

关于日本民族及民族性格的研究，是北大《日本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围绕这个课题先后发表了若干篇论文。例如，《日本学》第一辑上周一良的《日本推理小说与清代考据之学——一种文化的比较》、陈玉龙的《“汉字文化圈”论纲》、宋成有的《试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戊辰战争的民族特色》、贾蕙萱的《日本称“道”文化》；《日本学》第二辑上夏冰的《集团意识历史发展初探》；《日本学》第四辑上王顺洪的《日本人的交际——兼论同中国人的差异》、张麟声的《从感情的表达方式看日本式行为趋向》；《日本学》第五辑上刘德有的《日本政界文化现象漫谈》、盛勤的《试论日本集团效忠意识到历史演变》等；《日本学》第七辑上沈仁安的《武士阶级形成史论》、严绍璁的《日本古代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尚会鹏的《家元制度与日本社团的一般特征》；《日本学》第八辑上唐利国的《蒋百里与戴季陶日本观的比较》；《日本学》第九辑上韩昇的《日本古代大陆移民集团溯源》；《日本学》第十辑上李宗惠的《日本人与松》等。上述论文，或者从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评述日本民族文化的特征；或者从民族缘起、家族制度、语言习惯等方面入手探讨日本的民族性问题；或者从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矛盾冲突事件等课题出发评析日本民族性格的独特性。

前十辑的《日本学》上围绕日本民族性格的文化特点发表了多篇国外著名学者的论文。例如，《日本学》第一辑上梅原猛的《日本文化论》；《日本学》第二辑上赖肖尔的《日本的独特性与国际化》、科尔尼洛夫的《论日本文化的类型学——“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中的日本文化》；《日本学》第五辑上千宗室的《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等。这些论文的发表对开阔中国学者及读者的视野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在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静态研究多，而动态研究少”；“抽象议论多，而具体分析少”；“只列举光明面，而

忽视阴暗面”；“视角局限于文化心理现象，而忽视政治经济制度”等。^①

（三）组稿存在的主要问题

选题失衡，“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与应用、冷门与热点的选题上，过去偏重于前者，而今天似有偏重于后者”，急就篇、重复劳动居多。敏感性缺乏，需要加强对国内外动向加以掌握的政治敏感性。^② 上述问题，反映了 90 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申请课题项目的竞争、职称评定的压力和竞争的加剧等因素对中国日本史研究造成的冲击。在某些场合，“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那种耐得住寂寞、埋头学问的景象逐渐淡出，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开始抬头。风气之下，立足现实、追风热点问题、突出应用性的研究日益活跃，专业性强的基础性研究或冷门问题却较少有问津，结果是研究课题雷同，缺乏深思熟虑和新视角的文章数量不少，有些论文的质量不高。

为此，《日本学》办刊坚持以下几点：“不排斥译文”，把握国外研究的新动向；“鼓励争鸣”，除热点问题外，注重课题研究的均衡分布，通过学术争鸣提升研究水平；扩大交流与影响，及时反映高水平学术对话的信息，加强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力度。^③ 《日本学》第一辑选登了在 1988 年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大化改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如日本学者佐藤宗淳的《日本人的大化改新观》、鬼头清明的《大化改新的主体势力与部民制》、铃木靖民的《东亚形势与日本》、吉村武彦的《关于公地公民制》、门胁祯二等的《大化改新后的阶级状况》、原秀三郎的《大化改新后日本社会的性质》等；同时刊登了中国学者沈仁安的《“改新之诏”系原诏论》、王家骅的《从“王土”思想在日本的发展看大化改新诏书的可

① 沈仁安：《〈日本学〉编辑点滴思考》，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 442—447 页。

② 同上书，第 447—449 页。

③ 同上。

靠性》、宋家钰的《唐日民户授田制度相异问题试释——均田制与班田制比较研究之一》等论文。通过发表中日学者的会议论文,将双方的争论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大化改新这一日本古代史研究重大问题的学术争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本学》第三辑,专设“中日书学研讨会”栏目,相关会议论文,如日本学者杉村邦彦的《杨守敬来日与日本书法家的交流》、鱼佳和晃的《张裕钊对宫岛大八的指导及其方法》、野上史郎的《北方心泉:为人及其书法的意义》,中国学者陈玉龙的《中日书法艺术同源异流考辨》等,围绕中日文化交流历程中的书法奇葩展开深入研究,对两国在“汉字文化圈”中的定位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三、《日本学》创刊后第二个十年的进展与特点

2000年,《日本学》进入第二个十年。编委会人员进行了调整,执行主编先后由王新生、刘金才、白智立、宋成有、金勋等轮流担任,至2010年共出版五辑,平均两年一辑,发表各类文章近150篇、约165万字。

相对于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了新世纪中国日本研究的新特点。

中日关系冷暖不定的新态势,对研究的选题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新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大局基本稳定,并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互为对方不可脱离的重要经贸伙伴、东亚集团安全的合作对象。如何进一步发展并健全两国关系,是《日本学》作者群关心的重大问题。除继续开展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语言和民族性格等课题研究,发表王建华的《日本经济的艰难调整与“新经济”——日本如何应对经济的“全球化”》等论文外,还对某些重要问题进行相对集中的研讨。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北大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在2002年联合举办了“中日民间交流的未来——以经济文化为中心”国际学术讨论会。围绕如何

在新世纪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以推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课题，《日本学》第十二辑选登了一组会议论文。其中既有中国学者的文章，如刘德有的《中日友好的源泉：民间交流——以中日民间友好与文化交流为中心》、王晓秋的《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沈海涛的《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顺洪和刘新芝的《三十年来日本的“汉语热”》、初晓波的《浅析中日关系中相互理解的问题》、南敬铭的《中日民间交流的友好使者冈松庆久》等，也有日本学者和名人的作品，如石井明的《日中友好势力与亲台势力的斗争——论1963年周鸿庆事件》、远藤弘喜的《世代相传的友好与民间交流》、栗原小卷的《中日发展民间友好交流》等。^①正如“以民促官”交流方式的历史见证人刘德有先生所说，“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历程，“是新中国同世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史上所未有过的。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广大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为在新世纪发展两国民间交流，他提出了五点主张，即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原点”，“切实地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进一步拓宽中日文化交流的领域”，“培养接班人”，建立“重情义”的人际关系。^②

与此同时，围绕着日本右翼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发行、东海油田开发、日本某些势力介入“台独”逆流、钓鱼岛归属、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民间索赔等问题，摩擦和麻烦不断。特别是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在当政期间，不顾中、韩等邻国的一再抗议，顽固地坚持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将日中政治关系降到了“冰点”。这些摩擦和麻烦刺激着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神经，人们对上述问题

①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② 刘德有：《中日友好的源泉：民间交流——以中日民间友好与文化交流为中心》，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